

●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

# 中国抗日战争与美国远东政策的演变

韩永利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韩永利(1954-),男,湖北荆州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摘要] 美国在日本侵略中国初期阶段奉行对日绥靖妥协政策,而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启和坚持,促使了美国远东政策向积极方面转化,最后确立了对日抗衡政策。

[关键词] 中国;抗日战争;美国;远东政策;演变

[中图分类号] K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4-0433-05

中国抗日战争开启和发展时期,是西方国家推行对东西方法西斯局部侵略战争实施绥靖政策的关键性时期。这一时期,受到绥靖政策严重制约的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人民的反抗法西斯斗争相继失败,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阻断了绥靖政策在远东推行的传统轨迹,这一点从中国抗日战争对美国远东政策演变的重大影响中可以得到证明。

##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初期美国的远东妥协政策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初期,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侵略行径所关注的主要在于自身在华权益的维护,对日本法西斯战争野心以及最终将危及到自身安全问题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对作为弱国的中国能否成功地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持怀疑态度。因此,美国这一期间会同英国对日本侵华行径采取了妥协纵容的政策。

首先占领中国,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世界战略的第一步。而将美国和英国作为未来的攻击对手,早就列在日本的战略构想之中。1927年,日本内阁根据“东方会议”精神制定的文件中谈到:“若夫华盛顿九国条约,纯为贸易商战之精神,乃英、美富国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那之势力,即军备缩小案亦不外英、美等国欲限制我国军力之盛大,使无征服广大支那领土之军备能力,而置支那富源于英、美富力吸收之下,无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sup>[1]</sup>(第80,81页)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制定的国防方针便把美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并制订了击败美国太平洋舰队,夺取美国在太平洋的菲律宾和关岛海军基地的作战计划。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不仅公开了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野心,同时也迈出了对英美挑战的步伐。但是,英美对日本的侵略性行径采取了纵容的绥靖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在9月21日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文中曾认为,日本军人的这一行动是有预谋的<sup>[2]</sup>(P.3)。但是,詹森的看法在当时却不为美国上层人物认可。9月22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对日本驻美大使谈到,他始终对日本以外相币原重喜郎为代表的“稳健派”充满信心。美国“目前正在做的就是努力加强币原的地位”<sup>[3]</sup>(P.3)。但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大侵略的行径使史汀生不能不重视事变发展的趋势。10月20日,史汀生指令照会日本称:“希望中日两国制止任何可以导致战争的措施,并且在最近将来能寻求用和平方法,……解决目前的争论问题。”<sup>[4]</sup>(P.27)这一文件会同国联的态度,都是试图在中日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姿态,根本不敢正视日本侵略的事实。美国驻国联普遍裁军会议代表休斯·戴维斯也对日本驻国联代表团团长松冈洋右说:“美国了解日本的利益和困难,国务卿对日本并无敌意,反而确信日本最佳利益之所在,恰如确信美国在一些条约和世界和平利益中的权利和责任。……假如日本采取积极态度,在世界各国的道义支持下与各国合作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会得到非常有益的机会,日本应当抓住这个机会。”<sup>[5]</sup>(P.105)正是由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大国在“九一八事

变”时期表现出的纵容、妥协的绥靖政策,使日本看到了英美等华盛顿体系主导国的软弱,因此,加快了在中国的侵略步伐。

1933 年初,日本在山海关发动战事,在中国大陆南下的趋向明显,也进一步威胁英美在中国的主要利益区域。但是,史汀生对日本驻美大使强调说,美国的态度“目的在于以和平方式维持和平和解决国际纠纷”<sup>[2]</sup>(P. 113, 115)。英美的态度使日本更加胆大妄为。1934 年 1 月 5 日,日本统制派军人在“处理政治事变纲要”中提到:“此后仍以武力支持对华国策的实行,要有不惜挑起对英美战争的决心。”<sup>[3]</sup>(第 116 页)4 月 17 日,日本外务省国际信息与情报部主任天羽发表“非正式”声明,“由于日本在与中国的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日本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的观点和态度或许在每一方面与其他各国不相一致,但是必须认清,日本肩负着尽最大努力实行它的使命和履行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sup>[4]</sup>(P. 224)。10 月,日本在英美日伦敦有关华盛顿会议签订的海军条约续订问题的会谈中,提出各种军舰的吨位与英美均等的要求。12 月 29 日,日本驻美大使或斋藤博照会美国,宣布日本将于 1936 年 12 月 31 日终止 1922 年华盛顿海军条约。1935 年,日本财阀狂妄叫嚣:“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1936 年 8 月 7 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洋发展。”<sup>[4]</sup>(第 136 页)日本公开表示要独占中国和获取东亚霸权,实际上是看诸列强在保护本国在中国的利益问题上走多远。美国国务卿赫尔则是指示远东司制定一个方案,尽量减少与日本的摩擦<sup>[5]</sup>(P. 109)。1932 年到 1936 年,美国对日本出口的战略物资和原料占美国总出口的 1/3; 1936 年到 1937 年,美国对日本输出的石油和废钢铁就增加了一倍<sup>[5]</sup>(P. 109, 346, 372)。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美国军政上层还在观望,看中国能否坚持抗战。1937 年 7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简报的说法是:“……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将对世界和平及进步构成重大打击。”同时,美国政府仍然将关注点集中在自身的在华权益之上<sup>[2]</sup>(P. 321, 355, 356)。9 月 2 日,赫尔致格鲁电中称:“在目前紧张局势中,美国政府努力遵循一条完全客观的路线,……国务卿欣慰地得知日本感到美国的方针旨在公正和无偏见。”<sup>[2]</sup>(P. 362, 363)美国仍然在经济上对日本战争机器输血,日本从美国进口战争所需资源占其战争所需资源总进口的情况是:废钢铁 90%, 铅 45%, 铜 90%, 石油和石油制品 65%, 发展飞机和坦克工业所需的机床占 70%<sup>[6]</sup>(第 189 页)。11 月 3 日,应中国要求,《九国公约》缔约国和后来加入的国家以及特邀苏联共 19 国在布鲁塞尔开会,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赫尔认为:如果对日本施加经济制裁,美国就得承担最沉重的负担。因为日美之间的贸易额为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总和的两倍……。而如果经济制裁导致战争,美国同样得承受最沉重的负担<sup>[7]</sup>(P. 553)。而英国的态度是,在“目前危机中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美国政策的基础上”<sup>[8]</sup>(第 143 页)。因此,布鲁塞尔会议没有就反对日本全面侵略中国问题做出任何有效决议。

对于英美对日妥协政策,中国共产党人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936 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sup>[9]</sup>(第 402 页)对于美国纵容日本的后果,毛泽东曾指出:“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sup>[10]</sup>(第 187 页)

毕竟中国不同于其它在局部战争阶段被西方国家牺牲的国家的命运,也正是在英美等国对日实施绥靖妥协政策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倡导和努力下,中国建立起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开始了近代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这一深刻变化标志着西方国家左右中国政局,单方面拿中国利益作交易时代的结束。

##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与美国远东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从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中国形成了牵制和打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现实,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促使美国远东政策从以往的一味对日妥协,发展为既有妥协又有制约日本的双重政策阶段,美国这种政策松动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启和坚持。

1938 年 1 月初,鉴于中国抗日战争坚持发展的局面,美国明确表示了愿意以贷款方式援助中国,“希望中国继续抵抗”,“不愿中国丧失领土、放弃任何权利”的意向<sup>[11]</sup>(第 77 页)。1938 年底,中美之间达成桐油借款协议,次年 2 月正式签约。当时中国《文汇报》社论认为,英美对华贷款,“足以表明英、美已确切认识中国抗战力之伟大”。《中美日报》认为,贷款“是远东外交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而且也是国际形势向有利于中国抗战方面转变的开端”。“此项贷款的最大意义,足以表示英、美对于中国‘抗战必胜’的信任。”孔祥熙在答记者问中则说,“此举实为日本意料不及,而无异于当头一棒也”。也应中国方面的要求,1938 年中,美国对日本实施“道义禁运”,劝阻 148 家注册出口飞机、飞机部件、引擎和炸弹

鱼雷等武器的厂商停止向日本出售这类产品<sup>[12]</sup> (第341, 345, 346, 352页)。蒋介石政府还力促美国从对华商业贷款方式转向金融支持和直接的经济援助。

中国也进一步要求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1938年5月22日, 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 “……美国所可采用之有效工具且包括下列诸事, 即绝对禁运军用材料及器具与日本, 尤以钢铁与煤油为最, ……”<sup>[13]</sup> (第39页) 1939年7月20日, 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电函中又提出: “……禁止日本重要物品之输入, 增加日本物品之进口税率, 一如对德国物品之办法; ……不许日本船只使用特种商港, 以及其他类似性质之办法。”<sup>[14]</sup> (第83页) 1939年1至4月, 中国政府首脑和外交部多次向美方告知日本侵占中国海南岛所表现出来的南进动向, 要求中美英法加强军事合作, 一致对付日本侵略, 并在4月14日的中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出详细的合作原则与事项<sup>[15]</sup> (第314, 315页)。

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在美英等国引起强烈反响, 从而影响英美的远东政策。美国的舆论也由同情中国转向赞扬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1937年8月29日, 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上书赫尔, 要求“……立即援引九国公约及改变美国观望政策”。11月5日, 美国劳工联盟领袖发表对中国抗战的声援演说: “我们的生活不能跟中国大众的分开来”。“……如果我们默许日本帝国主义, 以其全部新锐的武器来对付中国民众而毫不牵制它, 那么, 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 并给美国种下祸根。”“我们必须使美国民众明白, 中国民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 日本帝国主义的胜败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再也不能让美国被日本用来作为进攻中国民众的根据地。”<sup>[16]</sup> (第640页) 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也指出: 日本进攻中国, 实际上“是对民主制度的总体挑战, 是法西斯的挑战”。采取制止日本的侵略步骤, 就应该“全力支援中国”, “经济制裁日本”。他甚至向美国国务院建议: “联合苏联, 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sup>[17]</sup> (P. 264) 一些国会议员提议断绝与日本的经济关系, 以经济制约日本的侵略行径。1939年8月30日, 胡适致中国外交部电文中说: 本日发表之民意测验, 关于美政府废止日美商约事, 赞成者81%, 不赞成者19%。有关于6个月后商约期满, 美国应否禁售军火原料与日本, 赞成者禁售82%, 不赞成者18%<sup>[18]</sup> (第390, 399页)。可以看到, 中国自身抗战的局面, 对美国远东政策选择开始激起了一层波澜, 促使了美国采取双重政策。1939年1月31日, 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讲话, 阐发了“阻止日本统治整个太平洋”的观点<sup>[19]</sup> (第356页)。1939年6月, 美国通知日本终止1911年美日商务条约。1940年3月, 美国给中国第二笔商业贷款。1939年1月28日, 毛泽东分析了美日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后指出: 日本“在外交上, 更表现着孤立, ……现在英、美正在商量, 要用经济制裁去惩治它一下。过去美国有中立法, 这种立法对中国不利, 反而对日本有利。现在日美关系搞得不好, 因为日本要独吞, 英、美在华利益被削弱了”<sup>[15]</sup> (第153, 154页)。

1938年间, 罗斯福还首次派出海军陆战队埃文斯·卡尔森上尉考察中国抗战得以坚持的原因。卡尔森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 “生动叙述了他在共产党人当中发现的‘奇迹’。他们没有外援, 但他们已经组织了一支以广大农民的支持为基础的游击队”<sup>[16]</sup> (第23, 24页)。美国除采取间接援华措施和中止日美通商条约之外, 也对日本策划建立的汪伪政权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1939年11月7日, 赫尔表达美方对日本准备建立汪精卫伪政权的态度说: “……我们的看法是, 这将纯粹是一个人为建造的政权, 而且这一政权的存在将依赖于日本的军事支持, 这一政权将缺乏中国公众任何自动和真心的广泛支持; 这一政权主要被设计为服务于日本的特殊目的, 恰如近些年来日本主持下在满洲、内蒙、北平和南京建立的政权。”<sup>[17]</sup> (P. 35) 3月30日, 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 “从1931年发生于中国各地的情况看来, 在南京建立一个新政权, 是一个国家通过武力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邻国的计划中的又一步骤, 这一步骤将这一邻国的广大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从正常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割裂开来。……美国政府再次声明在国际法和现有条约和协定之下充分保留权利。”<sup>[17]</sup> (P. 60)

美国上述政策的变化, 说明由于中国长期持久抗战, 促使了美国远东政策由“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时期的较为完整的对日妥协绥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促进的结果。当然, 美国远东政策的彻底转变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但是, 回复到中国全面抗战开启以前的政策是不可能了。

## 中国抗日战争与美国对日抗衡政策确立

1940年6月的法国败降引起国际格局的重组, 日本积极进行南进准备, 美国也直接面临着东西方法西斯战争的威胁。美国远东政策也由此将中国抗日战争纳入到抑制日本南进的战略考虑。同时, 中国抗日战争也推动了美国最终确立对日抗衡政策, 消弭其政策中对日绥靖妥协的残留因素。

由于中国抗战是拖住日本南进后退的现实因素, 因此, 美国一些官员积极主张加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40年10月23日,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对美国援华不力提出批评说: “……我们并未给予任何东西, 既没有付出生命, 也没有献出财富, 来帮助他们, 而他们正在抗击那些一旦成功注定会集结一切由征服得来的力量来打击我们的人们。”<sup>[12]</sup> (第429页)

中国政府在新的形势下也加强了促使美国确立援华抗日政策的力度。11月28日, 蒋介石致罗斯福“……中国的今

国抗战是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坚持下来的,因为中国相信民主国家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法国的崩溃,各小国的不战而降,以及德国军队的不断取胜均不无动摇此一信念的可能。”<sup>[12]</sup>(第527,528页)由于中方的推动,也由于美国面临的战争威胁,1941年3月31日,罗斯福决定在保密情况下着手以“租借法案”援华计划<sup>[16]</sup>(第52,58页)。1940年12月15日,罗斯福颁布法令,允许美国飞行人员离职到中国作战。1941年6月上旬,两批总计100余人的美国志愿航空人员赴华,并组织起美国志愿航空队。罗斯福政府还与蒋介石政府商讨由美国飞机从中国秘密空军基地出发,担负用燃烧弹袭击东京和日本其它城市的任务的计划<sup>[16]</sup>(第71,80,81页)。8月,美国政府支持在中国建立了以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志愿航空队,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10月,应中方要求,美国派遣以马格鲁德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中国,标志着美国援华政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对日制裁与援华抗战一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鉴于日本南进准备的加强,美国逐步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1940年7月2日列出46项禁止出口的项目。7月26日规定禁止石油产品和废旧钢铁等项目。9月26日宣布自1940年10月16日起,所有等级的废旧钢铁一律实行许可证制度<sup>[17]</sup>(P.222,223)。12月10日宣布从1940年12月30日开始,禁止从美国出口钢和铁。其后至1941年4月,罗斯福又签署一系列公告,宣布大约100多禁运项目。1941年5月28日,将禁止出口物资的范围规定为:美国的领土、美国属地和殖民地,包括菲律宾群岛、巴拿马运河区、哥伦比亚特区<sup>[17]</sup>(P.232-263)。日本进兵印度支那南部,美国断绝了对日本石油供应和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对日实施经济制裁达到最高峰。可以说,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经济制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存在。因为美国需要中国抗战拖住日本南进的步伐。

中国抗日战争也推动美国抹掉其对日政策中尚存的绥靖痕迹,抑制了美日谈判中可能的妥协。美国与日本的谈判正式开始于1941年4月16日。在谈判中,美国方面主要依据了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进行交涉。7月底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南部后,美国为了延缓日本南进步伐,仍然想通过与日本的谈判达成相应妥协<sup>[17]</sup>(P.552-559)。

对于美国与日本谈判可能达成的危害中国利益和抗战的妥协问题,中国坚决反对。毛泽东指出:“美国决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很显然,我们的这种希望是和英国、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希望相符合的,可惜在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国会方面,都还有一部分不明大义的人,阻挠着人民的意志的实现,因此,英、美的人民现在必须努力战胜这种时代的障碍,把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sup>[18]</sup>(第669页)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和呼吁是十分及时的,说明中国不会容许任何西方国家以他国利益为代价换取与侵略者妥协的行为在中国重演。1941年9月10日,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在与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斯等人的会晤中表示:“中国相信,任何与日本谈判而求得和平的安排都不会对中国有利,从长远观点看,也不会对美国有利,因为日本是远东所有其它各国的敌人。”<sup>[12]</sup>(第575页)

在中国的努力之下,1941年9月4日,赫尔向胡适表示:美国政府“不会考虑在未召见中国大使并与他和他的政府就事情的全部进行商讨之前,进行影响中国局势的谈判”。胡适在会晤中申明中国不会与日本言和的态度<sup>[12]</sup>(第574页)。中方的态度是美国在谈判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1941年11月22日,美日关系及谈判发展到关键阶段,为了拖延与日本开战的时间,罗斯福政府考虑对日妥协的“临时协定草案”<sup>[12]</sup>(第582,583页)。“临时协定草案”的要害是两点:第一,美国放松对日本已经开始的经济制裁;第二,允许日本驻兵印度支那。这两点都意味着牺牲中国抗战。胡适当即向美方提出: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驻军会对中国抗战构成威胁;美国不能放松对日本经济制裁这一有效武器。25日,胡适访问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顾问霍恩贝克,表达中国政府对《临时协定草案》的异议。同日,蒋介石电致宋子文向美方指出:“……倘若美国放宽经济封锁及冻结日本财产,或是即使美国正作此方面考虑的报道散布开来,……则中国人民将认为中国已完全被美国牺牲。”<sup>[12]</sup>(第586-588,592,593页)胡适大使将中国外交部部长郭泰祺的照会交赫尔,指责美国的《临时协定》是意图牺牲中国,绥靖日本。英国也不同意美国供应日本石油以及若干日军驻屯越南。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批评《临时协定》<sup>[20]</sup>(第770,771页)。美国民众和一些美国官员也不赞成美国的对日妥协,呼吁不要牺牲中国。在各方反对和中国所持坚决态度的影响下,美国政府打消了与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念头。这是中、英等国和美国有识之士共同极力反对的结果,其中美国不可能无视中国的态度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其深刻意涵在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战略地位。

纵观美国远东政策变化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局部战争阶段世界其它地区,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改变了西方大国主导国际关系的历史轨迹。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既拯救了自己民族,也推动了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促进了亚太地区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最终形成。

## [参 考 文 献]

[1] 彭明.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 第3册. 71.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Vol. II [Z].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 [3] 复旦大学历史系. 日本帝国主义外侵略史料选编 [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4] [日] 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 下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5] BORG, Dorothy & OKAMOTO, Shumpei.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 [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 [6] 樊亢, 等. 外国经济史: 第3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7] HULL, Corde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I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 [8] [美] 阿瑟·林克, 等. 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 中册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
- [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1]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战时外交(一) [Z]. 台北: 文物供应社, 1981.
- [12] 章伯锋, 庄建平. 抗日战争第四卷, 外交: 上卷 [Z].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 [13] 赵荣起. 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 [Z]. 台北: 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 1978.
- [14] 彭明.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 第5册(上) [Z].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1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6] [美] 迈克尔·沙勒.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1938—1945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1; Vol. III [Z].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 [18] 毛泽东. 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2卷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19] [日] 矶野富士子.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 [20] 吴相湘.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下册 [M]. 台北: 综合月刊社, 1974.

(责任编辑 桂莉)

##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 Evolution of U.S. Far-east Policy

HAN Yong-li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AN Yong-li (1954-),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 China-foreign relations.

**Abstract:** U.S. pursued an appeasement policy on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during 1931—1937. China with the start and persistence of Anti-Japanese War impelled the U.S. to change the policy to contending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 words:** China; Anti-Japanese War; U.S.; Far-east policy; evolution